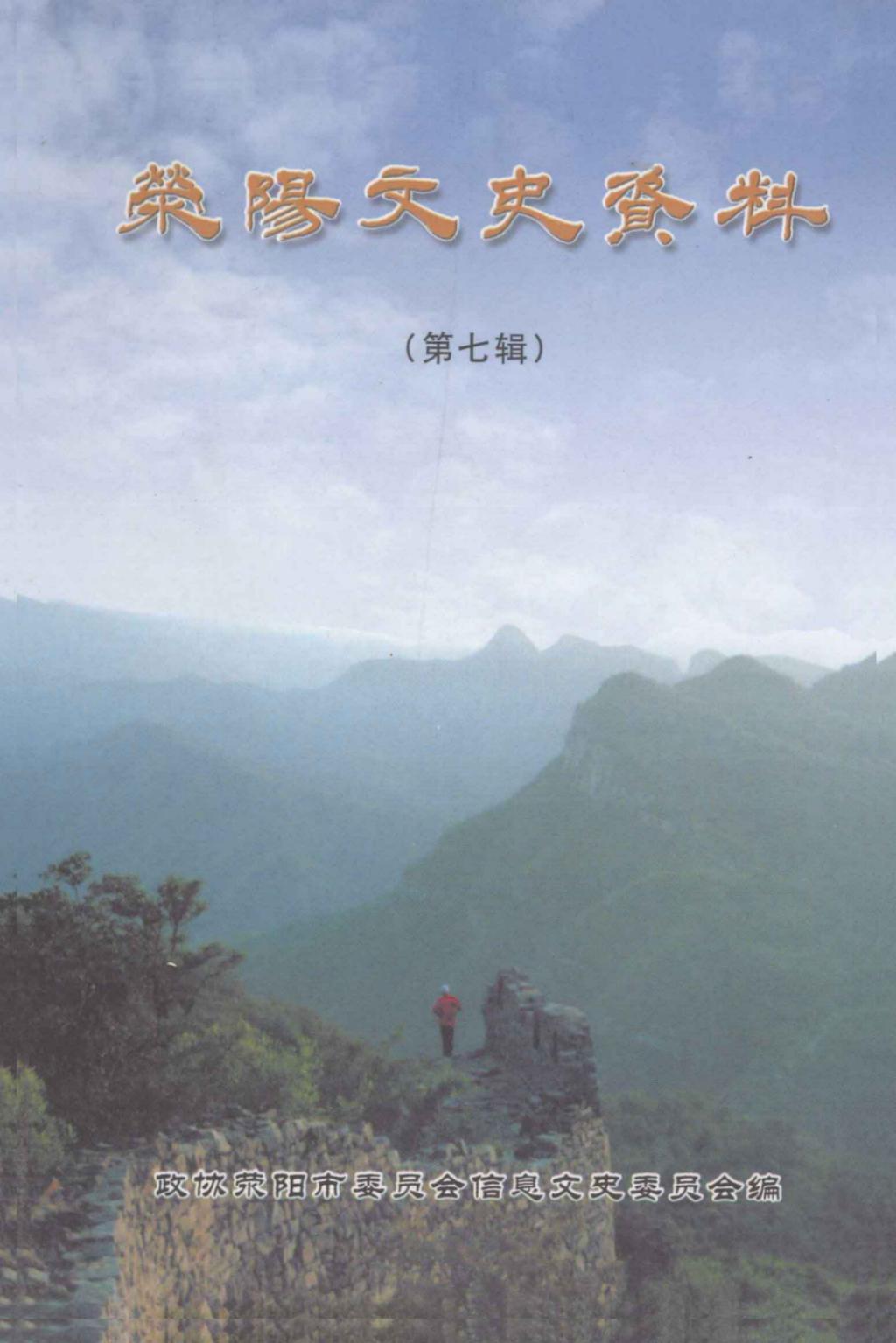


榮陽文史資料

(第七輯)

A scenic landscape photograph showing a range of mountains in the background, their peaks obscured by a layer of mist or low-hanging clouds. In the foreground, there's a rocky outcrop with some sparse vegetation. A single person wearing a red jacket and a white cap stands on the rocks, looking towards the mountains.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serene and somewhat dramatic due to the lighting and the mist.

政协榮陽市委员会信息文史委员会编

荥陽文史資料

(第七辑)



政协荥阳市委员会信息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六年九月

政协荥阳市委员会信息文史委员会 成 员 名 单

主 任：赵喜梅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黔斌 王根成 王韶聪 车桂英 吴宝贵

周功盈 周聚民 赵宝玉 谈俊红 贾鸿昌

蒋绍斌 鲁淑清 楚 翔 楚天遂

本辑编审：李建东 闫红举 邢长春 郭超凡 郑保贵

韦庆华 赵炎利 王和祥

主 编：韦庆华

副主编：李贻涛

责任编辑：赵喜梅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黔斌 王根成 王韶聪 车桂英 安焕章

吴宝贵 周功盈 周聚民 赵宝玉 谈俊红

贾鸿昌 蒋绍斌 鲁淑清 楚 翔 楚天遂

目 录

流金岁月

- 难忘的建国大游行 王永襄 (1)
我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李贻涛 (5)
我与荥阳人民广播电台五十年 李俊辉 (11)
我在三十八军当娃娃兵 邢瑾瑜 (14)

人物春秋

- 怀念我的父亲张漫萍 赵彭生 (16)
历史功臣王其德功勋碑 王龙章 王金鼎 (19)
怀念我的父亲相永才 相河徽 (22)
我所认识的张勋同志 王龙章 (25)
韩凤楼的一份自传
..... 韩光炜 韩光滢提供 陈万卿整理 (34)

- 拳拳桑梓情 赵西岳 (53)
李子青先生墓表 王济撰文 李鹤龄整理 (57)

往事如烟

- 抗美援朝中的荥阳人民 翟国正 (60)
为了胜利 让电流通过身体 候录口述 翟国正整理 (66)
农业合作化的萌芽 翟国正 (69)
忆豫西行政干部学校 刘书俊 (73)
回忆豫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 任文德 候云龙回忆 王龙章整理 (78)

烽火燎原

- 创建荥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高河支部 张治平 (84)
中共郑荥广支部的建立 张治平 (91)
成立中共荥汜广县委 张治平 (97)
马固战斗的回忆 杨炳星 (104)
淮海战役中的龙王庙阻击战 杨炳星 (107)
军粮列车开往前线 孔子俊 (110)
三十八军老战士回忆广武抗战
..... 邢喜林口述 翟国正整理 (112)

今昔霄壤

- 土地联产承包给俺村带来的变化 翟国正 (119)
回忆县法律顾问处的撤销与恢复 刘书俊 (128)
科技改变了吴村 季玉璞 (137)

日寇暴行

- 刻骨铭心的童年见闻
——忆日伪给董村百姓带来的灾难 张书明 (139)
我亲历的日军暴行 郑玉田 (146)

旧闻琐记

- 第一部婚姻法在荥阳实施前后 刘书俊 (150)
与不法商斗争的年代 邢瑾瑜 (156)
霍雷县长住俺村 袁华珍 (158)
县委书记李瑞林二三事 李 信 (162)
骇人听闻的“三月匪祸” 周显才 (166)
1942年灾荒见闻 王龙章 (171)

封面说明 王龙章 (138)

难忘的建国大游行

王永襄

大凡儿时经过的事情，都记忆犹新。就说当年的大游行吧，抗美援朝、解放台湾、反对美帝侵略古巴，以至后来“文革”时欢呼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和庆祝粉碎“四人帮”，自己亲自参加的不下十次、二十次，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要算是1949年10月1日的萧索川“建国大游行”了。

那时我六、七岁年纪。记得县城是头年秋天解放的，剿匪、反霸、搞土改、分田、分房、分农具，正当华年的父亲扛起“三八大盖”当了农民自卫队长，母亲也风风火火地参加了农民协会。每逢吃罢饭，听罢南学“高台”上的“时事广播”，爹娘便把我们姐弟往院里一锁，就搬上小板凳渡水过河，到河东农会议论起大事来。

像是又过了一年的秋收时节，那晚上我耐不住寂寞，偷偷翻过院墙，来到南场隔河东望，透过月光下朦胧的夜幕，听到农会里人声鼎沸，还时不时地听到大人们齐齐地高喊着什么。

夜半过后，兴奋的爹娘还激情难耐，回到家里仍喋喋不休地说“北京”、“建国”、“游行”什么的。

次晨东方还未发亮，爹爹就拍打我的屁股催着起床。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看，见爹爹穿着合身的黑色粗布裤，腰里神气地扎着牛皮腰带；娘拿着鸭蛋似的小圆镜照啊，抿啊，把一头乌发梳理得油光闪亮，鬓角上边还插着一朵鲜艳的大红花。匆匆喝罢两碗稀粥，娘说：“建国了，北京大检阅，咱乡里也大游行。”又说：“阵势大，人乱，小孩只准站在路边看，不得乱跑。”从小生性活泼、好看稀奇，娘说是娘说，跑不跑由我，我心里想。

“老乡们，建国大游行就要开始了，大家快到萧索川集合啊！”高台广播一吆喝，上河、下河、河东、西垴“呼隆隆”一下子聚集了几百号、上千号人，在温煦煦的秋阳照耀下，横幅、大旗、锣鼓、秧歌，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上下一里多长的大河谷汇成了一片欢乐的大海洋。

本来是惊天动地，说来也怪，不知啥时候哨子一响，大河谷一下子静寂下来。一位腰扎宽皮带、上挎盒子枪、身穿灰衣、头戴灰帽的人站在土地庙前的供桌上指挥队伍。他身材魁梧，粗眉大眼，一张口连声音也带着嗡声嗡气的铜音。我认准他是驻俺村的工作人员，人称“顾政委”，还在俺家吃过糠菜饼子、喝过糠糊糊呢，我叫他“顾叔叔”。这时，只听顾叔叔高声地说：“老乡们，同志们！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京天安门上检阅几十万人游行，我们也大游行，毛主席也在看着我们呐！”顿时，“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河谷上下。我光脊梁穿着小裤衩，双手叉着腰和小朋友们高高地站在坡顶上。放眼四望，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像是过春节大年一样，喊声、欢呼声铺天盖地。

在顾叔叔指挥下，人群流动了。红旗前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大画像引路，锣鼓“咚咚锵锵”地敲着，一队队灰衣、灰帽的工作队员高喊着“一二一、一二一”地向前跨进；俺娘、俺婶婶、俺姑姑她们一群小媳妇、大姑娘们打着花棍、扭着秧歌，欢快地翩翩前行；再后面是爹爹、叔叔和大伯们威风凛凛的民兵队伍，他们扎着皮带，扛着大枪、迈着矫健的步伐“一二一”地向前挺进。沟沿上、门台上是拄着拐杖、捣着小脚的老头、老婆们。北院二爷爷前几年缺吃少穿，贫病交加，因交不起稞子被村东恶霸打得死去活来，至今还佝偻着伤腰。他捻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变了，变了，天真的变了！”旁边的五奶奶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搭着凉棚，双眼泪花花地说：“俺东沟沿那三亩地还能要回来吗？俺家您五哥可是因为人家霸占咱的地被气死的呀……”这时，从旁边走过来挎盒子枪的顾叔叔说：“大娘，建国了，国家政权属于咱人民了，斗地主分田地，被霸占的土地就要回老家了……”顾叔叔一席话，激励得游行的人们又一阵阵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我认准了是顾叔叔，一个箭步窜了上去，在他的盒子枪上拽了一把。他先是一惊，扭头一看是我这个小精灵，眉开眼笑地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又在我松弛的肚皮上打了一个“响漂”，高兴地说：“好，小伙子，再过二十年天下就是你们的，人民的政权还要靠你们来执掌呢！进来吧，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向前挺进吧！”我听不懂他说的啥，只知道一伸手抓过他手中的小红旗，雄赳赳地一走一举，一举一喊，喊的啥，我至今只记得“毛主席”、“共产党”、“新中国”。

就这样，随着队伍跨河、过桥、爬坡、上崖，走过了临近的山山沟沟，经过了附近的村村寨寨，真比正月十六玩龙灯还热闹。

以后，长大了，上学了，参加了工作，知道了“革命就是盛大的节日”；还知道了“顾政委”进了县委，去了开封，后来又听说他去了省委。每次在报上看到他的活动，我都忘不了他指挥的那次大游行。

（王永襄，曾任市志办总编辑、文化局副局长等职，现为荥阳市教育体育局退休干部。）

我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李 贻 涛

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1974年、1976年，中央两次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尤其是1976年12月的会议上提出了“普及大寨县”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荥阳县委也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的四级干部会议，提出建成大寨县的目标。我是1977年夏高中毕业的，正赶上参加那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7年6月下旬，正是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期。我在高中毕业的第二天，就被生产队派往西南山区的张青岗参加英雄渠、降龙渠和环山渠的“三渠汇流”工程，去修龙脖水库。我和李贻欣、李国涛年龄一般大的三个年轻人，赶着毛驴车，一路走，一路问，从清早出发，到天黑后才赶到。当时不知道那地方叫什么名字。30年后，再次路过才知，那个地

方叫张青岗村。当时天黑黑，山莽莽，只有不远处上街503铝矾矿上的几盏灯晃着光，很是旷古和神秘。我在那里的山沟里抬石头，拉石头。一个多月后，大队里抽我回村，安排我到王砦大队林场工作了一段时间。一收秋，农村的学大寨移山造田运动就开始了，公社先是组织生产队长到大寨参观后，又组织生产队社员骨干到高山、西张砦等地参观“农田成畦，水池成方，果树成片，居住成庄”的典型。我高中毕业，在村里也算有了点文化，就被分配到王砦大队农田基本建设的测平工程组去做测平，并负责监测工程质量。

和我们在一组搞测量的有连文江、连玉西、张怀德等人，我们几人的主要任务是测平土地。那时，全大队6个村的男女社员全集中起来了，有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各自都有又宽又大的彩绸红旗，各队的劳力又划分成若干个劳动小组，以民兵编制，社员民兵的任务是按照我们技术测平后的标高进行挖方填方。

在这期间，我们测平人员，测量了一块田地，做好了高度标志后，平整土地的大队人马开来了，红旗猎猎地，一派高昂气氛。社员民兵们进驻后，我们测平人员及时地转移到另外的村庄地块进行测量，当时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测量了楚砦村三队东南地，二队东地，一队村西南的地块，王砦村村东南，东赵家垌南地，西赵家垌西地，红沟村北，山沟村东北地等地

块，共有近千亩地。

搞测量工作是很苦的，我们几个人组织人员在山坡岗地培土选定被测量点，再找个基准点，作为观测地方，支架起测平仪，三个人轮换着观测，记录和立标尺。标尺有十斤重，合起来有一人高，抽出有4米高，扛着在山坡岗地不停地奔跑一天，下来真是累得够呛。我们几人中，他们几个都年龄大些，我年龄最小，自然我扛得最多。有时地块大，几百亩地，必须一口气测量完，中间连饭也吃不上，但到哪个村、哪个队测量，队长是很重视的，也跟前跑后的为我们打下手，搞服务，十分热心。

测量完了后，取了数据回来，晚上坐在白炽灯下，进行均衡计算。那时没有计算机，全凭一把算盘进行加减乘除。我打算盘就是那时练出来的，打的速度和准确度都还是可以的。冬天寒夜里，外边风抽得屋檐呜呜叫，屋内我们精力高度集中，计算着，哪里该挖方，哪里该填方，全在一张大大的绘图纸上标出来。算好后，再设计将来该在哪个方位打井，水流方向该是如何设计，全都标示清楚。之后再根据水井水流方位设计出坡度。坡度大了不行，大了水土容易流失，冲坏土地，下头存不完水，上头存不住水。坡度小了也不行，小了，水流缓慢，造成漫畦儿，浪费水资源。我们根据本地实际，一般设计规划在千分之三的坡度。这个坡度的设计是考虑了当时深浅水泵的通常流量流速大小和普通作物特征、地貌、光线、风向而定的。

计算好标高后，接着，我们指导生产队，组织社员民兵培训挖被测点的标高，一般是低的培起一个标高土堆儿，高的下挖一个方坑，在坑里整出标高平面，在基准平面上洒上石灰作标记，以供农田基建大军进驻时作参考。

最枯燥的时候，是测量和计算，最热闹的时候则是与1000多个男女民兵一起平土方。除了测量，我们还要每天到平整工地监测指导社员们平整土地。来来回回几个村几里地往返跑。测量了两块土地，将数据存好，这空档，我就到工地上去，与各村各队的社员一同劳动。那真是旷世仅有的一种劳动，是一种大军团作战式的战役。大军团作战气氛空前，工地上四周都立有很多标语牌儿，“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学习大寨造梯田，一年粮产过江南”、“誓把山水重安排，亩亩建成大寨田”、“学大寨，要大干”、“出大力，流大汗”的雄心壮志和革命加拼命的劲头高涨异常。

当然，这类标语不仅限工地，在村里墙面房山写得很多，宣传效果也好，我家北院屋后墙就常有标语，那是学校郭教师的手迹。

在平整土地中，凡是遇到沟池、高岗的一律平整，凡是土坟的大都平掉。一派挑灯夜战，口号声声，红旗招展，红红火火的景象。真的叫山河换了新颜。我们立在工地上，可以望到西边的万山东南坡上三分地一个的大字：“愚公移山，改造梯田”。那

气氛、环境把社员们改天换地，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劲头，鼓得足足的。有了低落情绪，或累得拉不动腿脚时，指挥部就不知从哪里领来了豫东的说唱队，在地头、饭场给大家演唱，说书。说书的内容都是革命性和时事性极强的，如《平原枪声》、时新小段。社员们坐在地埂上、锨把上、架子车上，或端着饭碗拿着蒸馍一边吃一边听，一边嬉一边乐。头顶红旗飘，场里有书声，在当年，已是神仙的日子了。当然，女社员不轻松，还要趁歇工抽出鞋底子纳几针，家中男人、孩子等着过冬鞋呢。书说到了段落，劲也歇足了，公社里派下来的驻队干部老陈嘻嘻哈哈扬着手，催促道，该上班了，该上班了！社员不叫“上班”，叫“出工”，驻队干部在机关惯了才叫“上班！”对驻队干部的说法，社员们仍是嘻嘻哈哈地乐，“老陈，啥丫子上班，俺都叫出工！”老陈也乐了，“出工，出工，就叫出工！”大家乐着，心里却仍感念那书听得不过瘾，但仍是高高兴兴地各自奔赴了各自的劳动场地。

除了参与在大军团的学大寨运动，我还受生产队之托，多次为我们楚砦二队测量土地。我记忆中的那片土地，漫坡遍野都是国家划定的产棉区，一眼望去，高岗坡地，沟道梁脊，起起伏伏，一地的棉花。起初，我和队里的李金章一同测量土地。李金章是解放前从武汉测绘学校毕业，在国民党部队反正后回村，是村中很受人敬重的文化人。后来，测量土地，由我

主持在楚砦东北地测量了多次，使岗坡洼地成为了平展如砥的良田。那时，队里买不起水准仪，仪器是从郑州第36中学借来的。我家西邻的李贻珍在那里教书，是通过他借来的。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开始拨乱反正。以后的改革开放的20年里，虽不再提“农业学大寨”运动，但中央每年一号文件都要安排“三农”工作，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对“三农”异常的重视。

农业学大寨运动从开始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当我再走近当年测量平整过的土地时，那里早已是一片希望的田野，若不是当年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那里仍是荒山、仍是野坡、仍是乱坟岗。我们那时的人，总算为这片土地做了点什么。再等若干年过去，我会对儿子说，这是我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测平的，那时，心中会升起一种欣慰和自豪。

（李贻涛，男，1960年出生，荥阳市豫龙镇楚砦村人，现任荥阳市政协秘书长、作协主席。）

我与荥阳人民广播电台五十年

李俊辉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经济条件不允许，收音机也很少，小收音机根本见不到。只有县委宣传部（荥阳东街）有一台收音机，有重要新闻，如1953年斯大林逝世。县委通知各部门，得跑几里路，到县委宣传部听广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广播，看到收音机，当时同志们高兴地说：这东西真神，离北京一千多里，能听到北京的声音。

随后我就自己动手做个小木盒，买来自然铜喇叭碗。做了一个土造收音机。那时我在火车站附近上班、住宿，离554台近，能收听新闻，声音不大，能听见就高兴的不得了。到六十年代，郑州造出黄河牌收音机，每台要78元。当时我月工资只有30多元，还是买不起。后来火车站就有了有线广播。自己买了铁丝偷着挂到广播线上，接到室内，这样才能一天三晌听上广